



【忆海拾珠】

李桂芳的“老歌”

□苗得雨

当年孟良崮战役时,搭“人桥”出了名的李桂芳,后来也被评为“沂蒙红嫂”式人物之一,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。人们说,她实际是几个“红”,“红大姐”、“红女干部”,还是“红业余作者”、“红歌手”。前些年,家乡沂南县编《沂南歌谣》和《沂蒙红歌》时,她提供了很多别人都已记不得了的“老歌”,战时老小调。她大半生以来,每段经历中,都有很多老故事。人们可知道,她当副县长时,孟良崮绿化、大庄桥的修建等等,都有她的心血与汗水……

但她毕生最迷的,还是文艺、创作与歌唱。她家是南岩麓,沂蒙山的中心地带。小时,给地主家看孩子,受过苦。1940年,15岁的她就参加了军。分配到省战工会(即战时省府)下属的医院部门。鬼子“扫荡”时,一些党政部门“化整为零”,进行活动。她虽说快是个大姑娘了,但个头矮,又瘦,就被剃了光头,“化”到家乡一带当“放牛小”。蹦蹦跳跳在儿童堆里。人们说:“那是谁家的野小子?”她活泼、爱唱,见歌就学,学了就不忘。她记性好。于是就记住了抗战初期那些年好些流行的歌,成了有名的“歌篓子”。后来转业当了艾山乡的妇女主任,也是走到哪唱到哪。战争时期,是歌唱的年代。报纸开展工农通讯运动时,她又当了工农通讯员。她也和我一样,投的稿多是文艺作品。她的歌谣诗《清晨起来有九声》,先发表在《鲁中大众》报上。又发到省青联编的《文化翻身》上。现在一些老人提起来,差不多都能背过,“解放区里好光景,清晨起来有九声:喀啦喀啦的织布声,嗡嗡嗡嗡的纺线声,吱喂吱喂的小车声,呼噜呼噜的推磨声,吱咯吱咯的轧碾声,嗷哇嗷哇的耕地声,刚当刚当的锄地声,呱唧呱唧的说话声,仔细听一听,说来说去支前声。”只抓住了一个“声”字,就写出了解放区的各种情景。(还应当有读书声,唱歌声吧!)

战时的一些老歌,同属一个县的我,好些都想不起来或唱不完全了。她却都记得一清二楚。特别与家乡一带有关的,有这个“记得清”,宝贵的历史资料就不失传了。如关于1941年11月大青山突围的:“老乡同胞听我言,沂南有个大青山,大青山,不平凡,人人都称赞。革命战士真英勇,三天三夜不下火线,为了民族的解放,为了人类的生存,千名战士倒在了大青山。大青山啊真可怜,人仰马又翻,国际友人汉斯希伯,永远牺牲在大青山。大青山精神永不忘,世世代代往下传,世世代代往下传!”再如关于“沂蒙母亲”于大娘的:“沂南艾山乡,有个女乡长于大娘,提起于大娘,人人都夸奖,为革命,不怕苦,工作日夜忙,真是个好榜样,真是个好榜样!”(以上两首都是秦丕山、刘洁记谱)还十分宝贵的,是一首歌唱孟良崮战役的:“叫声老大娘,细听我来讲,孟良崮战斗打得真漂亮。高的是大炮,低的是步枪,不高不低的是机关枪。机枪更登登,大炮轰隆隆,七十四师全都丧了命。机枪扫,大炮轰,我军齐冲锋,七十四师全都丧了命。我说老大娘!”这一首明显是李桂芳的填词之作,有另外一首歌,就是这样唱的:“叫声老大娘,细听我来讲,开开大门号你两间房,我说大娘啊……”在书中,两首还恰挨在一起。搜集者都是于芳。

□郑民德

灾荒连年,漕赋沉重

清代的朝城县位于山东、河南、河北三省交界地带,地势平坦,临近运河,是重要的交通枢纽,其先属东昌府,次属濮州直隶州,后归曹州府管辖,行政管理经历了数次变化。朝城县土地质量一般,农业经济不是很发达,百姓在交纳国家漕粮后,只能满足温饱,所以一旦处于难以生存的境地,就会进行反抗与斗争。

首先,频年的灾荒是导致百姓闹漕的重要原因。道光、咸丰时,山东运河流域水、旱、蝗不断,而封建政府为满足运河水源供给,忽视农业水利建设的做法,又加剧了百姓的苦难。为缓和对抗情绪,顺治、乾隆、道光时期曾多次豁免朝城县因受灾荒与战乱影响的漕粮征收,但由于灾害规模大,贫困人口多,政府赈济不利,无异于杯水车薪,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与民之间的敌对情绪。

其次,战乱与匪患加剧了山东运河流域民众反抗压迫、拒交漕粮、抵制浮收的斗争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)山东发生大灾,地方官员妄征漕赋,引起寿张人王伦起义,他攻占寿张、阳谷、堂邑等县,并围攻运河名镇临清,使清政府陷入恐慌之中,清廷调集重兵方将其镇压。其后,太平天国、捻军两次大规模的起义方兴未艾,与清军在临

【口述城事】

一张老股票见证博山“舌尖”往事

□王济州

这是一张87年前的老股票:高25.8厘米,长26厘米,发行于中华民国十六年(1927年)二月初五日,为印刷品填写件,上面印有“博山聚乐村成记股票”(第六号)。从票面文字可以看出,它是当年博山聚乐村饭庄股东决定在东城闹市大街附近开办分号时,集资募股发行的股票。股票持有者石玉亭时任博山北岭东升窑厂经理,认购1股,铜圆300吊。此次饭庄共发行股票200股,融资60000吊。

这是一张罕见的手写版餐饮股票,其重新面世有力地佐证了当年博山餐饮业的辉煌及运营方式的规范。聚乐村饭庄是博山最早采用规范股份制创建运营的企业,也是鲁中第一家以宴席形式为经营特色的“会馆式”餐馆。创建时集股合资经营,并发行股票。后又多次扩大经营,募股融资。股东多为博山著名商号与富裕家族以及餐饮行业的管理人员。

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,随着炉、窑、炭三大行业的兴盛,博山已是“车马辐辏,万商云集”,当时燕翅席、海参席、鱿鱼席等成规制宴席已逐渐流行。博山菜系的形成,一方面得益于当地雄厚的经济基础,另一方面则受惠于清代博山人孙宝仍的直接推动。孙宝仍曾任光禄寺掌醢署署正,职责是管理皇官膳食、酒宴等。其父孙廷铨曾任康熙朝秘书院大学士,

清代,国家漕粮每年400万石,从山东、河南等有漕八省征收。道光、咸丰时,山东运河流域不但运道淤塞,而且太平军、捻军、宗教组织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,致使城镇被毁、经济衰退,百姓流离失所。在这种情况下,地方官府依然不知抚恤百姓,而是任意苛征漕粮,滥收、浮收,无恶不作,结果引起了百姓的武装反抗,其中道光、咸丰年间的朝城县百姓闹漕,即是典型的案例。

清、高唐、兖州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,致使生灵涂炭,朝城县甚至连县衙都毁于兵灾,只能赁民房办公。除大的兵燹外,清中后期,山东地方治安也相当混乱,白莲教、清水教、天柱教遍布,教众往往与匪徒相勾结,抢劫掳掠,杀人放火,给普通百姓造成了巨大灾难,致使他们再也无力交纳国家粮赋。

沉重的漕赋是导致百姓闹漕的根本原因。朝城县早在乾隆时漕粮浮收就非常严重,据《朝城县志续志》载,朝城漕额远远高于周边的范县与观城,百姓到漕仓纳粮,要遭受征粮胥吏的种种勒索,往往交纳超过正额数倍的漕粮。苛索与压榨,增加了基层百姓的困境,进而滋长了与官府对立的情绪,因此闹漕就成为减轻负担、争取权利的一种手段。

闹漕案连发五次

朝城闹漕案发生于道光二十四年(1844)、二十七年(1847)、咸丰元年(1851)、二年(1852)、三年(1852),总计5次,延续达十年之久,其频率之高在全国都极为罕见,这也说明了清中后期山东运河区域基层社会是异常混乱的。

道光二十四年(1844)夏,朝城连日大雨,庄稼被淹,百姓受灾。时任知县董坤下乡勘灾,随从胥吏骚扰乡间,引起了百姓

的不满与愤怒。九月初十,东南乡郭家庄申来玉召集500余人进城控诉,要求县令减免漕赋,赈济百姓,董坤为平息民怒,暂时应允了百姓的要求。出城后,百姓愤怒难忍,又烧毁胥吏赵凤翔的房子,殴伤另一胥吏赵金邦。在这种情况下,县令拘捕带头闹事的张衫等人,结果引起申来玉聚集千人围城,县令不得不释放张衫,百姓斗争取得胜利。此次闹漕结束后,道光二十七年(1847)秋,又有上百万百姓攻打县衙,殴伤官员,连知县刘树棠都被打伤,因怕处分,不敢向上级部门报告。道光三十年(1850)任滕蛟上任朝城县令,不知恤民,导致咸丰元年、二年连续发生闹漕事件,其规模虽不如道光时,但仍破坏了清政府在地方社会的统治秩序。

咸丰三年(1852)七月,朝城连续大雨三天,乡间积水很多,民众纷纷向县衙报灾。八月十二日,当县令任滕蛟从乡间勘灾回衙后,乡民韩存柱、孙际美纠集北乡十一村民众数百人闹漕。据《山东军兴纪略》载,闹漕群众突入县城,围攻县衙,乱扔石子砖块,不但胥吏丁役皆被伤,甚至县令任滕蛟也被砖石所中。清廷接到奏报后,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,所获韩存柱、孙际美等人或被斩首,或被充军,处罚相当严酷。清廷之所以如此凶残,是因为朝城年年闹漕、岁岁抗官的现状令统治者非常头疼,当安抚不能起到应

有的作用时,就采取杀一儆百的惩罚措施稳定地方社会。另外,太平天国北伐军与捻军此时在山东已有结合的趋势,如果再与地方民众联合对抗清廷,必然难以处理,所以这次闹漕为统治者所不容。

但如不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,刑罚只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咸丰四年(1854),朝城人李潮燕又聚众起事,率数百人冒充太平军攻破县城,杀死县令任腾蛟,并焚烧官衙,释放囚犯、攻打周边州县,巨野等县县令、教谕、典史、千总被杀数十人。同治二年(1863),莘县再发漕案,东昌太守秦际隆软弱无能,在带领兵丁前往捕拿时,闻风丧胆,不但藏于草丛深处躲匿,而且兵丁星散,不敢出府城半步。正是由于地方官治民无方、昏庸无能、贪污压榨百姓,所以当时山东地区“群盗蔓延,骸骨相枕藉,牧令震惊窜伏,视民之生死不与己事,其刚心义胆为民立命者百不一”,地方社会完全陷入失控状态。

山东朝城闹漕案与江南那种通常的和平诉讼不同,而是依靠秘密宗教与结社组织为纽带,通过暴力反抗的方式去争取公平与利益。在闹漕的过程中,中央与地方政府或举止失措,或迷信武力镇压,无法采取有效办法平息争端,结果导致闹漕事件愈演愈烈,最后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。



博山聚乐村成记股票



博山「四四席」资料片

的精美菜品,并嫁接了满汉全席的规制,它与历史上在京为官、掌厨的博山人对京城皇室餐饮制度的借鉴具有直接关系。博山的“四四席”,由聚乐村饭庄首创为四拼盘、四行件、四大件、四饭菜的套餐,不仅讲究荤素、冷热的搭配,而且注重礼仪、寓意的协调。

民国八年(1919)二月十三日,张新曾邀请博山实业界名人石毓麟、程少鲁等入股(共募集50股,总计铜圆10000吊),又聘请栾玉琢、王广辅担任经理、副经理,共同创立了聚乐村饭庄。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,聚乐村饭庄由叠道街迁到西冶街新址后,经营达到鼎盛。民国二十六年(1937年),日军侵占博山后,聚乐村饭庄的生意逐渐凋零,时开时停。1948年淄博解放后,聚乐村饭庄才逐渐恢复、发展起来,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名厨大师,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食客。

当年,各界要人、名士前往博山,大都光顾聚乐村饭庄,其中包括名满天下的京剧界“四大名旦”。1960年11月9日,梅兰芳亲率剧团来到博山。演出结束后,他在聚乐村饭庄设宴招待同事与票友。此时正值生活困难时期,物质极度匮乏。大厨们倾力拿出看家本领,虽无山珍海味,却能粗饭细作,令梅先生等赞不绝口,为饭庄留下了一段青涩而美好的回忆。

人称“孙阁老”。孙氏父子的特殊经历,影响了家乡餐饮文化的发展。就在孙宝仍担任光禄寺署正期间,各地菜系纷纷融入皇室菜品之中。受其启发,他在回乡后便将京师皇家风味与当地菜品结合,对博山菜系的

丰富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。

至今,博山的茶汤制作仍被视为一绝,这与孙宝仍供职光禄寺时京师皇家风味的传递关系密切。而著名的博山“四四席”,也沿用了许多皇家御膳中